

中国现代史

(中册)

徐锡祺

北京教育学院

1991年10月

目

录

第五讲 我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

第六讲 曲折前进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1958—1966)

第七讲 政治上“左”倾错误的发展

第八讲 社会主义事业的大曲折

第九讲 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

第五讲 我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

一、关于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十大关系

1956年生产资料所有制社会主义改造的决定性胜利，使中国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这个新时期，已由打破旧的生产关系转变为在新的生产关系下保护和发展生产力。如何充分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调动广大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加速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步伐，把我国建设成为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就成为摆在全党和全国人民面前的迫切需要解决的中心任务。

中国共产党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开始于1956年春。当时为准备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政治报告，检查和总结1953—1957年第一个五年计划的执行情况，研究中国经济发展的道路，毛泽东和中央其他领导人，连续听取了工业、运输业、农业、商业、财政等34个部门的汇报，最后毛泽东汇总成十个问题，在4月26日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作了《论十大关系》报告。报告论述了中国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需要认真解决的涉及政治、经济的问题，并探索了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

报告在经济方面论述了：一、重工业和轻工业、农业的关系；二、沿海工业和内地工业的关系；三、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的关系；四、国家、生产单位和生产者个人的关系；五、中央和地方的关系。在政治方面论述了：一、汉族和少数民族关系；二、党和非党的关系；三、革命和反革命的关系；四、是非关系。最后专门论述了中国和外国关系。这十个问题，都是围绕着一个基本方针，就是要

把国内外一切积极因素调动起来，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

在重工业和轻工业、农业的关系上，毛泽东指出：“重工业是我国建设的重点。必须优先发展生产资料的生产，这是已经定了的。但是决不可以因此忽视生活资料尤其是粮食的生产。”“从长远观点来看，多发展一些农业轻工业，会使重工业发展得多些和快些。而且由于保障了人民生活的需要，会使它发展的基础更加稳固。”

在沿海工业和内地工业的关系上，毛泽东指出：我国工业过去约有70%集中在沿海，只有30%在内地，这是历史上形成的一种不合理的状况。因此，现在“新的工业大部分应当摆在内地，使工业布局逐步平衡，并且利于备战，这是毫无疑义的”。但也要“好好地利用和发展沿海的工业老底子”，才能“使我们更有力量来发展和支持内地工业”。

在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的关系问题上，毛泽东指出：国防不可没有，但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军政费用比重较大，占到国家预算全部支出的30%。报告要求降低军政费用，以便抽出更多的资金，多开些工厂，多造些机器。“只有经济建设发展得更快了，国防建设才能够有更大的进步”。

在国家、生产单位和生产者个人的关系问题上，毛泽东强调，“都必须兼顾，不能只顾一头。无论只顾那一头，都是不利于社会主义，不利于无产阶级专政的。”鉴于苏联采取义务交售制等办法把农民挖得很苦和我们自己在粮食问题上的经验教训，毛泽东强调“我们必须更多地注意处理好国家同农民的关系。”要关心群众生活，反对不关心群众痛痒的官僚主义。

在中央和地方的关系问题上，毛泽东指出：“为了建设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必须有中央的强有力的统一领导，必须有全国的统一计划和统一纪律，破坏这种必要的统一，是不允许的。”但我们也“应当在巩固中央统一领导的前提下，扩大一点地方的权力，给地方更多的独立性，让地方办更多的事情”。他说：“有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比只有一个积极性好得多。我们不能象苏联那样，把什么都集中到中央，把地方卡得死死的，一点机动权也没有。”

在汉族和少数民族的关系问题上，“我们着重反对大汉族主义。地方民族主义也要反对，但是那一般地不是重点。”

在党和非党的关系上，我们将实行“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

在是非关系问题上，毛泽东指出：是非一定要搞清楚，原则问题不能含糊。但对犯错误的同志则应采取“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

在革命和反革命的关系问题上，毛泽东指出：镇反和肃反都是必要的，今后仍要镇压和肃清反革命分子。但在反革命已减少的新形势下，我们对反革命分子的处理应坚持“少捉少杀”，尽量争取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

在中国和外国关系问题上，“我们的方针是，一切民族、一切国家的长处都要学。但是，必须有分析有批判地学，不能盲目地学，不能一切照抄，机械搬运。他们的短处、缺点，当然不要学。”

毛泽东的《论十大关系》，以苏联和东欧国家的经验为鉴戒，初步总结了我国的建设经验，提出了全面建设中国社会主义的一系列

列重大政策。从此开始提出了自己的建设路线。这个报告也激发了全国各部门、各地区、各方面探索中国自己的建设道路的积极性。这也为后来八大制订建设的战略方针和发展道路提供了思想的和理论的基础。

二、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

1、召开“八大”的背景

中共中央考虑酝酿召开“八大”比较早。1952年底，中央政治局和书记处就曾想在召开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同时召开党的“八大”。由于1953年下半年，中央觉察了高岗、饶漱石反党活动问题，就推迟了召开“八大”的准备工作。经过1954年2月党的七届四中全会和1955年3月党的全国代表会议，对于这个事件作了严肃的处理。在这两年多的时间里，党中央制定了过渡时期的总路线，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通过和公布了宪法，并开始实行第一个五年计划。同时又通过了整党、建党、审查干部、总路线宣传、社会主义改造，这一切为召开党的“八大”作了充分的政治准备和组织准备。中央认为召开“八大”的时机完全成熟了。这样，毛泽东在党的全国代表会议上宣布：中央决定1956年下半年召开党的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并要求全党“在这一年多的时间内，各方面的工作：经济、文教、军事、党务、政治思想、群众团体、统一战线、少数民族工作，都要大进一步。”毛泽东还表示：准备在党的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对党的工作，做出全面的总结，对工作中的错误缺点要求作公开的批评和自我批评。

从国际情况来看，也出现了一些新情况。1953年3月5日斯大林逝世后，苏联国内发生了重大变化。1956年2月召开的苏共二十大上赫鲁晓夫作秘密报告，全盘否定斯大林。二十大第一次揭露了斯大林的错误和苏联社会主义模式中的弊端。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激起了轩然大波。帝国主义者也乘机掀起世界性的反共反社会主义浪潮。

面对国内形势的变化，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出现的新情况，要求中国共产党对“七大”以来的工作，尤其是建国以来的工作，进行全面的系统的总结，作出正确的分析和结论，对国际形势作出正确的判断，从而制定中国共产党在新的历史时期的正确路线，提出社会主义建设、党的建设、国家建设、对外关系等方面的任务和政策。

2、“八大”的召开与“八大”所解决的主要问题

“八大”的目的和宗旨，毛泽东在“八大”预备会议上已作了说明。1956年8月30日，毛泽东在第一次预备会议上作了题为《增强党的团结，继承党的传统》报告，提出“八大”的历史任务，就是总结七大以来的历史经验，团结全党，团结国内外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为建设伟大的社会主义中国而奋斗。

1956年9月15日—27日，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这之前，8月30日—9月12日举行预备会议，主要任务是准备大会文件，进行八届中央委员会委员的预选和准备大会发言稿。

出席大会的代表有1026人，代表全国10734384名党员。59个国家的党派参加了大会。

会上，毛泽东致开幕词，刘少奇作《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向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政治报告》，周恩来作《关于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建议的报告》，邓小平作《关于修改党的章程的报告》。

大会一致同意这三个报告，通过了新的党章和《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关于政治报告的决议》和《关于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二个五年计划（1958—1962年）的建议》。并选出了新的中央委员会。在28日的八届一中全会上选举毛泽东为中共中央主席，刘、周、朱、陈为副主席，邓小平为总书记。

“八大”的主要问题可以概括为：

(1)正确地分析了我国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之后阶级关系和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确定把全党全国的工作重点转向社会主义经济建设。

“八大”指出，我国社会主义改造取得决定性胜利后，国内形势发生了两个根本性的变化：

第一个变化是社会制度上的根本变化。“八大”政治报告的决议指出：我国“几千年来的阶级剥削制度的历史已经基本上结束，社会主义的制度在我国已经基本上建立起来了”。我国社会实现了从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转变。社会主义革命取得了基本胜利，这就使我国出现了一种完全崭新的面貌。

第二个变化是国内阶级关系的根本变化。“八大”指出，我国在社会主义改造已经取得决定性胜利后，“我国的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已经基本上解决，两个剥削阶级（即官僚买办资产

阶级和封建地主阶级)已经消灭。”还有两个剥削阶级(即富农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正处在消灭的过程中”。“广大的农民和其他个体劳动者,已经变为社会主义的集体劳动者”,“工人阶级已经成为国家的领导阶级”。这就是中国出现的新形势和新面貌。

由于阶级关系的变化,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已不再是工人阶级同资产阶级的矛盾,而是“人民对于建立先进的工业国的要求同落后的农业国的现实之间的矛盾”,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这一矛盾的实质,“也就是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党和全国人民今后的主要任务是集中力量发展社会生产力,实现国家工业化,逐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生活的需要。因此,党的工作重点已不再是阶级斗争,而是领导人民进行社会主义建设。

当然,在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同时,“我国人民还必须为解放台湾而斗争,还必须为彻底完成社会主义改造,最后消灭剥削制度而斗争,还必须为继续肃清反革命残余势力而斗争。不坚决进行这些斗争,是决不允许的”。但是不可忘记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是在新的生产关系下面保护和发展生产力。

(2)在总结“一五”计划经验的基础上,制定了既反保守又反冒进即在综合平衡中稳步前进的经济工作方针,提出了建立、健全社会主义经济体制的设想。

“八大”在总结“一五”计划经验的基础上,提出了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建议。为确保“二五”计划的实现,“八

大”制定了一系列重要的方针政策。主要有：应该根据需要和可能，合理地规定国民经济发展速度，把计划放在既积极又稳妥可靠的基础上，以保证国民经济比较均衡地发展，象我们这样经济落后、人口众多的国家，各种物资缺乏是经常的现象，而物资多余则是暂时的现象。因此，特别需要我们增加后各力量，计划所造成的节约是最大的节约，计划所造成的浪费是最大的浪费；制定财政收入计划时，必须考虑经济发展的可能性，考虑积累和消费之间的比例关系，避免把收入定得过紧，以保证国家建设规模逐步扩大的同时，使人民生活得到逐步的改善，必须注意国民经济各部门和各方面的全面安排和综合平衡，妥善地安排好农、轻、重之间的关系，工农业生产和交通运输、商品流通之间的关系，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之间的关系，国家建设和人民生活之间的关系，以及中央和地方、沿海和内地、汉族和少数民族、中国和外国等的关系等，借以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和有用力量，建设社会主义。

关于我国社会主义经济体制问题，陈云在大会上有个发言，其基本精神为大会所接受，写进了政治报告的决议中。

陈云分析了社会主义改造高潮中出现的一些错误，指出这些错误是由于过多地实行了合并和统一计算盈亏而产生的质量下降、品种减少的现象，一部分服务性行业合并过多而产生的不便以及一部分农副产品生产有些下降等问题。针对这些问题，陈云提出“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以后，我们应该采取正确的方针指导企业的生产和经营。就是说，我们必须使消费品质量提高，品种增多，工农业产量扩大，服务行业服务周到，而决不是相反”。如何实现上述要求呢？

陈云就我国经济体制问题提出了“主体——补充”的构想。即：在工商业经济方面，国家经营和集体经营是工商业的主体，一定数量的个体经营是其补充；在生产计划方面，计划生产是工农业生产的主体，按市场变化在国家计划许可范围内的自由生产是其补充；在市场方面，国家市场是社会主义统一市场的主体，一定范围内国家领导的自由市场是国家市场的补充。陈云的这一构想对目前我国正在进行的体制改革，仍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3)根据巩固人民民主专政和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需要，大会确定要进一步扩大国家的民主生活，健全社会主义法制。

为适应全面开展社会主义建设新时期的需要，有效地担负起伟大的经济文化建设任务，“八大”在国家工作方面提出了两条。

一条是进一步发展人民民主，扩大国家的民主生活，开展反官僚主义的斗争。对此“八大”提出了四个必须加强，即加强人民群众对国家机关的批评监督，加强机关中下级工作人员对上级机关的批评监督，加强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对各级国家机关的监督，加强各级国家机关中由上而下和由下而上的监督。

另一条是制订比较完备的法律，做到“有法可依”和“有法必依”，以保证社会安定和人民生活秩序的正常，这样才能保护生产力的发展，才能充分发挥广大群众的积极性，推动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发展。

(4)根据新的形势，确定了我国对外关系的基本原则和方针政策。

中央估计世界大战一时很难打起来，没有战争，资本主义国家就要想办法做生意，出口技术。而我国经济文化还很落后，现在刚

开始搞工业，因此需要朋友，需要和平环境，需要同各国人民增进相互间的经济文化关系和友好往来。“八大”制定的对外政策是开放性的。毛泽东在会期期间会见外国共产党代表团时对此曾作了形象的说明：中国是世界和人类的组成部分，中国不能自私自利。中国是一张白纸，你们可以在这张纸上写字，你们的科学和文化可以驰骋在这张纸上。在中国人民生活的这块土地上，各国人都有份。

(5)加强党的建设

关于党的建设问题，“八大”着重提出了：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世界观，反对唯心论和形而上学；坚持理论联系实际，反对任何教条主义或经验主义的偏向；坚持党的群众路线，反对官僚主义；坚持党的民主集中制，扩大党内民主，反对个人崇拜；坚持党的团结，巩固党的统一，反对宗派主义；提高党员标准，反对任何特权。“八大”所提出的关于加强党的思想建设的主张，至今仍然具有十分重要的指导意义。

3、“八大”的路线为什么后来没能坚定不移地得到贯彻

“八大”开得很好，“八大”的路线也是正确的，但为什么没能坚定不移地贯彻下去？反而在“九大”被扣上了三顶大帽子：鼓吹“唯生产力论”、鼓吹阶级斗争熄灭论、反对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

邓小平在十二大开幕词对此作了原则性的回答：“八大的路线是正确的。但是，由于当时党对于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思想准备不足，八大提出的路线和许多正确意见没有能够在实践中坚持下去。”

限于当时的历史条件和经验不足，八大在有些重要问题上的认

识是有不足之处的。

(1)关于国内的主要矛盾和主要任务问题。八大虽提出了党的工作中心向社会主义建设转变的方针，指明了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已经基本结束，这当然是非常正确的，但它不适当地保留了“过渡时期”的提法，没有进一步明确指出阶级斗争只是在一定范围内还存在，已不再是我国国内的主要矛盾，这就为以后重提阶级斗争是国内的主要矛盾，留下了一个空子。这就同当时党对于社会主义社会阶级斗争的特点认识不足有关。

现在我们认识到在社会主义社会中阶级斗争已不再是主要矛盾，但它还在一定范围内长期存在，在某种条件下还有可能激化。社会主义社会的阶级斗争是在一定范围内的斗争，不能任意扩大，当然也不能加以抹煞。这种一定范围内的阶级斗争，就已经不是完整意义上的阶级斗争。这是广大人民群众同那些和剥削制度、剥削阶级相联系的各种敌对分子之间的斗争，这种斗争也已经不是大规模急风暴雨群众性的阶级斗争。

正由于党对这种阶级斗争的新特点认识不足，八大以后，当国际上出现了，国内有极少数右派兴风作浪攻击党和社会主义的时候，毛泽东对当时新形势下的复杂斗争作了错误分析，把阶级斗争估计得过于严重了，因而在他写《1957年夏季的形势》一文中指出，单有1956年在经济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是不移的“必须还有一个政治战线上和一个思想战线上的彻底的社会主义革命”。这就改变了八大关于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已经基本上完成”的明确结论。

9月在党的八届三中全会上，毛泽东又不顾许多与会同志维护

八大路线的正确意见，断言“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社会主义道路和资本主义道路的矛盾，毫无疑问，这是当前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这样，八大关于我国社会主义矛盾已经转变的正确分析，也就是八大路线的理论基础，就被整个推翻了。按照毛泽东的上述观点，必然会得出如下的结论：党的主要任务和工作重点不是发展生产力而是继续搞阶级斗争。尽管毛泽东在1958年初，还提出党的工作重点要转到技术革命、转到经济建设方面来，但是由于这种要求同他关于社会主要矛盾的认识是互相矛盾的，因而不可能坚定不移地实现这个战略转移。到八届十中全会以后，特别是“文化大革命”期间，终于提出了“以阶级斗争为纲”，大批所谓“唯生产力论”。

正是由于对主要矛盾问题上发展了动摇，对主要任务问题上的认识也就不可能坚定，所以后来党的工作重心又从社会主义建设回到了阶级斗争上。而这一点同当时对于所处的历史阶级的认识不明确也有关系。

八大一方面预见了社会主义建设新时期的到来，另一方面仍然把当时所处的历史阶段看作是“过渡时期”。八大党章总纲是把“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直到社会主义社会建成”为过渡时期（我们现在是把过渡时期同社会主义社会明确分开，区分的最主要标志就是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过渡时期在资本主义国家是从资本主义过渡到社会主义，在我国则是从新民主主义过渡到社会主义。过渡时期和社会主义社会是两个不同性质的阶段，这两个阶段的社会情况和阶级斗争情况，有着根本的不同。

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决议明确划分了建国以后的历史阶段，把前七年看作是从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在这以后则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社会主义时期。而社会主义阶段的最根本任务就是发展社会生产力。这样才能坚定不移地执行党在当前阶段的正确路线，把党的工作重点真正转移到社会主义建设上来。

(2)关于经济建设方针

八大虽然规定了既反保守又反冒进，综合平衡稳步前进的经济建设方针。但是党对全面开展社会主义建设的实际经验还很不足，对经济建设的理论研究和对我国实际情况的调查等一系列的具体准备工作也没有跟上，党内特别是党的领导核心对上述经济建设的总方针认识很不一致。

这种不一致具体表现在对当时经济建设中的主要倾向问题上，对我国经济建设的发展速度问题上。

八大虽经周恩来、陈云等人的力争，加进了反冒进的内容，从而坚持了五月党中央提出的上述方针，但当时把反冒进同反保守并列，实际上反保守还是列在第一位，这说明党内当时并没有认识到建设工作中的主要倾向是冒进问题。

从1955年错误地批判了邓子恢的右倾保守思想之后，在党内已开始出现由于害怕右倾保守而急于求成的盲目冒进情绪。但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既不可能认识到批判邓子恢是错误的，因而在反倾向的问题上，也就不可能有个正确的统一的认识。因此提出反冒进不久，在党的八届三中全会上毛泽东明确批判了1956年的反冒进，要求恢复“多快好省”、“农业纲要四十条”和“促进委

员会”，也就是恢复“左”的方针。会后，又提出了“大跃进”的口号，并在全国大批右倾保守思想。在1958年1月的南宁会议、2月的北京会议、3月的成都会议、4月的汉口会议，直至5月的八大二次会议，都不断地批反冒进，而且调子越来越高，说冒进是“马克思主义的”，“反冒进是“非马克思主义的”，反冒进是思想上的懒汉，是犯了“方针性右倾错误”，“离右派只有五十米”等等。规定以后只许提反右倾，不许提反冒进，并批判了所谓“消极平衡论”要求在经济建设中“不断打破旧的平衡”。这就完全否定了八大坚持的既反保守又反冒进，在综合平衡中稳步前进的经济建设方针。

到1958年5月召开的八大二次会议上，通过了“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和在这条总路线指导下发动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运动，便完全脱离了八大的经济建设的正确方针的轨道，使以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共产风为特征的“左”倾冒进错误泛滥成灾，导致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发生了严重曲折。

原来八大提出的改革经济管理体制的任务也在1958年“大跃进”的混乱形势下被引上了歧路。1958年6月2日，中央发出关于下放全业、事业单位的通知，要求在本月15日以前一律完成。在短短半个月內，中央工业部门所属企业、事业单位有80%下放地方管理。这种盲目的过多过急的作法，造成了极大的混乱和浪费，以致不久以后，又不得不宣布统统收回。在“左”倾思想指导下，生产、经营等各方面，限制得更严更死。八大肯定的留留地、

自由市场、自负盈亏等适合中国现阶段经济发展需要的事物，都被当做资本主义尾巴割掉了。

(3)关于党的集体领导、健全法制、反对个人崇拜等方针。八大虽然作出了坚持党内民主集中制和集体领导的原则，反对个人专断和个人崇拜的决定，但是同样由于缺乏自己亲身的实践经验作基础，认识是不深刻的，也没有制定出有效的具体措施来制止个人崇拜现象的发生。而随着在阶级问题上的迷误日益加深，随着反右派、反右倾、拔白旗、插红旗等运动的开展，统统被抛到九霄云外。代之而起的是党委“大权独揽”、“第一书记挂帅”，1959年取消司法部以至到文化大革命中“和尚打伞，无法无天”。“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变成了“一花独放”、“两家争鸣”。“长期共存，互相监督”变成了一句空话。与此同时，个人崇拜现象开始出现。在1958年成都会议上毛泽东提出：个人崇拜有两种，除了不正确的个人崇拜以外，还有所谓“正确的个人崇拜”。以至个别的地方负责人竟然在会上表示对毛泽东要“相信到迷信的程度”，“服从到盲从的程度”。至此，可以说八大的路线和方针已被破坏无遗了。

综上所述，从以上三个重大问题上，我们可以看到，八大当时的认识还是很不深刻的，八大本身有它的不足之处。这是同当时所处的历史条件，对于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思想准备不足有关。

虽然如此，八大仍然有着重大的历史意义。

4、八大的历史意义

八大的历史意义可以概括为以下三个主要方面：

(1)在我国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明确